

引 言

考察文学创作,应该首先追溯到作家自身,作家的生命形态直接决定了作品的面目,作家生命形态的变化发展也是其作品风格变化发展的直接原因。那么,翻开中国现代作家的人生画卷和创作经历,我们会发现大多数作家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创作欲望与审美倾向的最初形成以及汇入时代文学大潮以后的创作倾向和风格的发展,与他们自身的婚恋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是婚恋的欢乐,还是婚恋的痛苦,总是流淌于作家笔下的“活水”,是游荡在作家心中的“精灵”,构成了他们文学创作上永葆鲜活生命力的母题。渗透着作家对爱情、婚姻、人生和社会的种种体验和感悟,促进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与发展。

一、婚恋 促使无数热血青年跃上文坛

一谈到文学创作,人们立即会想到弗洛伊德陈旧的“宣泄说”。宣泄使力比多得到转移,使郁积的情欲得到释放。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作家性本能的升华,是受压抑的性本能所寻求的一条解脱途径。以宣泄说来解释作家们的写作动机,虽有偏颇之处,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就有一些作家因为要发泄长期被压

抑的情欲，而在艺术创作中寻找欢乐和满足的。但是单凭力比多难以写出不朽的文学作品，形成作家创作的动因还有着多种因素，比如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等而婚恋作为生命的原始形态，既与情欲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无时无刻不与现有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发生着种种矛盾和关联。婚姻爱情虽是个人的私事，是小事，但对人们的影响力也是相当大的，它往往是窥视社会经济政治、伦理道德、人情习俗的综合性窗口。在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们经受了最直接、最深重的肉体和精神痛苦，所以在五四个性解放潮流中，“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爱情神圣”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迫切要求的“人的权利”的共同呼声。客观上它成了广大青年反封建斗争的凝聚点，许多青年从这里走上反抗的道路。而在反抗道路的行程中，一个主要的反抗方式，就是他们拿起笔，来抒写自身那有了婚姻却无爱情的基础、或者有了爱情却永远失去了结婚的可能、或者背弃无爱的婚姻承受“万恶之首”体验的感喟，当然，也包含着他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憧憬。无论是初恋的纯洁悸动，热恋的炽情相思，还是失恋的感伤苦痛，无爱的哀怨煎熬，都牵动着无数的热血青年走进文学殿堂，为之吟咏抒怀，伤春悲秋。他们在文学的殿堂里以整个身心去感受反封建的时代大潮，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开始了对人的全新的描写。他们自觉地运用文学的形式承担着在特定时期生存的苦恼和时代的忧虑，表现着对家庭和社会深刻的思考。

当年鲁迅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使鲁迅感到一种难以摆脱的烦恼，感到一种异样的痛苦。但革命精神的亢进，又使他下定了献身祖国的决心，于是，在 1903 年他写下了一首《自题小像》的诗。在这首诗里，鲁迅第一次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并抒发了决定承受因袭的重担，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的誓言。在以后的生涯中，不幸的婚姻在他的内心世界掀起了更巨大的波澜，使他的心理和肌体都失去了平衡，陷入深深的悲痛、苦闷和压抑之中，文学成了他获得心灵平衡的最好形式，使他的心理重负取得

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彷徨》中的部分小说,《野草》中的部分散文诗,都是鲁迅缘婚恋而生,是鲁迅渴望情爱的心理被激发后的产物。

郭沫若与安娜爱情的圣水不仅滋润了郭沫若干枯的心,给他带来了生命的热情和信心,同时也激起了他写诗的欲望,给他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灵感与源泉。郭沫若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与安娜的恋情对他创作产生的影响。《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后为安娜而做。郭沫若为安娜献上了一首首火热的情诗,爱情使他迸发出新诗创作的激情,爱情成了他新诗创作的“酵母”。可以这样说,《女神》首先是一部自我恋情的颂歌,它有着无限的能量和热力。正是从这里,诗人才得以“发出音调,生出色彩,涌出新鲜的形象”,才有了对新世界、新生活的爱,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对光明、对未来和对理想的追求与向往。郭沫若正是在自我恋情的激励下走上文坛的,《女神》也是在自我恋情的催化下开放的绚烂的艺术之花。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坛上,有两本书曾经引起人们激烈的争议,并顿时成为畅销书。一本是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一本是章衣萍的散文集《情书一束》。这两本书都是描写青年人的恋爱和性苦闷的。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先后同几个日本女子相恋或同居。但这种在民族歧视下的情爱经历,最终必然是以悲剧而告终。他有合理的要求和美好的憧憬,但这一切不可能有圆满的结果。这深深刺激了郁达夫,使他走进了小说园地,运用文学的形式发泄他得不到爱的苦闷。《情书一束》是章衣萍根据自身一段颇为复杂的恋爱经历而写的书信体和日记体的散文。这复杂的恋爱,使他感到无力承担复杂的现世生存,无法实现生命的种种欲望,但却给文坛培育出一个散文家,营造了一个真善美的精神王国。在这个精神王国里,多数篇章表达了受封建礼教束缚和压抑的青年人要求自由恋爱的呼声,奏响了爱情弦索上的最强音。因此,叛逆者闻之鼓舞,卫道士闻之瑟缩。

徐志摩是一位典型的因情而生，缘情而灭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诗歌生命史就是他的婚恋兴衰史。他的四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中的爱情诗，使我们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他十年间的婚恋的波折变化。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等几个女性不仅连接起他一生的个人私生活的一面，也连接起他诗歌一个个支点，支撑着他走上文坛，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一直到他的文学生命的终结。

汪静之生活中也充满着女性的声音，他一直在为寻找灵感伴侣而歌吟。他的第一本诗集《蕙的风》就是为曹佩声、丁德贞、傅慧贞、符竹因四位女性写的爱情诗。如果在汪静之的人生中没有这四位女性的爱情，汪静之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位爱情诗人，也不可能有《蕙的风》的问世。

李金发是与法国的一位富家少女失恋以后，开始写诗的。后来，诗人又爱上一位德国少女展妲。爱情的灵感顺着诗人的笔尖流下，化作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诗篇，这才有了《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三部诗集的出现。在这几本诗集里有爱情幸福的欢快诵唱，又有爱情痛苦的感伤哀吟，体现出在象征意味观照下审美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庐隐短暂的一生先后经历过三次备受世俗非议的婚恋。她一直用文学创作来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她的文学创作几乎和她的婚恋生活融为一体，如果我们沿着《海滨故人》、《灵海潮汐》、《曼丽》、《归雁》、《云鸥情书集》、《东京小品》、《玫瑰的刺》等创作历程，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她婚恋的轨迹。她把自我的情感体验化为艺术的喷泉，让内心深处的情感小溪流淌出来，去折射外面的世界。

白薇虽然属于五四时期的时代女性，但她步入文坛的时间较晚于同代的女作家，大约在五四运动过去六七年之后，由于她与杨骚不幸恋情带来的焦虑和痛苦，使她走进了戏剧的创作领域。《苏菲》、

《琳丽》两个剧本写于她的苦恋初次经受创伤之日，表现的是一幕“血与泪”的爱情悲剧。小说《炸弹与征鸟》写于她再次被杨骚抛弃之时，表现的是受难的女性们的追求、挣扎和苦闷的呐喊。

丁玲与胡也频结合后，在爱的光辉的照耀下，从自身的情爱经历中提取了梦珂、莎菲的形象，真实地记录了新女性“出走”后的迷茫、苦闷和失望，突出表现了她们在情爱方面疏离了传统价值观念后又找不到出路的“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忧患感受。这些作品是矗立在丁玲心灵史上的一块块里程碑，它促使丁玲的兴趣发生了转移，转向对文学创作的痴迷，最终塑造了文学家丁玲。

戴望舒是一位从初恋的失意中走出的诗人。他视爱情为人的天然权利，至情至性，一旦投入，便不辞牺牲，地狱敢下。然而他的初恋情人却移情别恋，离他而去。他恋爱无望，欲罢不能，在深深的痛苦与绝望之中，写诗的欲望被充分调动酝酿发酵起来。他用凄婉的诗句抒写灵魂的创伤，使郁积的情感得到了释放，使爱的痛苦在言说中随词汇飘逝而去。诗集《我底记忆》、《望舒草》等留下了他爱的记忆。

萧红和萧军的结合，是现代文坛上的一桩佳话。他们超越了一般的恋爱程式，在患难中结为夫妻并一起步入文坛。萧红在萧军的引导下，发表了处女作《王阿嫂的死》，从此一颗女性作家的新星在中国文坛上兴起。但是，在以后的前行道路上，爱情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欢乐，反而给她造成一次次的伤痛。她在极度不安和痛苦的情绪状态中发奋写作，唱出了一曲曲人生悲歌。

苏青的写作生涯是从减轻丈夫的经济负担，缓解夫妻间的矛盾开始的。然而文章发表了，稿费也赚到了，夫妻间的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这更促使苏青做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女性的决心，在与丈夫结婚十年后终于离异。离婚后的苏青正式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散文集《浣锦集》、《涛》、《饮食男女》等，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文坛上名声

大噪,红极一时

从以上我们谈到的作家的创作情况来看,婚恋促使他们开始了笔耕的生涯。婚恋是他们文学生命闪光的起始点,也是他们人性亮点的最初展现。婚恋的记忆不仅在创作情感上始终缠绕着他们,而且也成为他们永恒的创作素材域。婚恋是他们创作生命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伴随着他们在文坛上不断地汲取,不断地浇灌出文学的硕果。

二、婚恋：促使无数现代文学名作问世

人们在婚恋体验中,大都会出现狂热、忘情、幻想、陶醉、焦虑、痛苦等心态。这些心态对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狂热和忘情,可以使人们文思汹涌,完全沉浸在想像、构思、布局之中,并可以与表现的对象熔为一炉,写我所思,抒我所感,发之肺腑,流自真情。如果不狂热不沉迷不忘情,就难以身临其境,就难以体会和描述得生动和真切。幻想和陶醉,可以使人们处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以幻为真,以虚为实,精神亢奋,浮想联翩,让被压抑的潜意识松动,产生创造的灵感,引发创作的冲动,激起表达的欲望。焦虑和痛苦,是产生深刻思想的催化剂,它可以诱发人们对现实的问题进行深思,从“小我”的苦闷出发,“苦吾苦以及人之苦”,抵达“大我”的痛苦,鞭笞丑恶,改造现实。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下,作家如果能准确地把握住人类生活或者说是生命中的某种共性,然后用恰当的艺术形式把它再现出来,也就促成了一种“不朽”的艺术,在文学的殿堂上光芒四射,绚烂多彩。

《尝试集》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表现的主要是五四时代先进的个性主义思想。而这种个性主义思想的表现又与胡适的婚恋密切相关。江冬秀、韦莲丝、陈衡哲等女性连接了胡适一生的

个人私生活的一面,也洒下了他诗歌创作中的一片光辉,他把与这几个女性的婚恋感应发酵为诗情发泄出来,为我国白话诗的兴起与发展留下了筚路蓝缕、开拓前行的足迹。

《瓶》是郭沫若诗歌创作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转变的一本过渡性的诗集。这本诗集中的那脍炙人口的爱情组诗,全是因一位“余抱节”小姐邀请郭沫若孤山探梅、西湖相见的情思引发的结果。郭沫若的杭州之行,虽然受人捉弄,未见姑娘的人影,但带回了青春,重新唤起了对爱情的渴求,从西湖汲取了一瓶清泉,给他的诗歌创作再次灌注了新的活力。诗中奇诡的想像,和缓的旋律,鲜明的抒情形象,优美的诗意诗境,都凝聚着郭沫若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向往。

《红豆》是闻一多写的一组精美的爱情诗。吐露的是作者与高孝贞婚后复杂的情爱感受。爱的幸福、爱的情趣、爱的忧虑、爱的苦闷,被他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从中感受到一股强大的个性解放思潮的涌动,其中有感于包办婚姻的忧愤与悲伤,也有满怀相思的恋情与蜜语。细品情味,甜中有苦,真实记录了他的婚恋心路历程。

《给亡妇》、《冬天》是朱自清的文学作品中情感最为浓厚、最为诚挚动人的名篇。他把对与自己相敬相爱,过早离开人世的伴侣的深切怀念,通过一些细微的家庭琐事表达出来,缠绵悱恻,情致真切,弹奏出一曲曲悼念亡妻的哀歌。这些悼念亡妇的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毫不逊色地享有它不可或缺的一席重要地位,产生着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虹》是茅盾在日本与秦德君同居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据秦德君 1985 年 4 月 6 日发表在香港《广角镜》第 151 期上的《我与茅盾的一段情》所述,是她提供了《虹》的创作素材,梅女士的原型,取材于秦德君的好友胡兰畦和她自己。秦德君兼有温顺与洒脱的女性内在本质,正与茅盾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灵魂意象相契合,这无疑对他塑造梅女士的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梦之谷》可以说是萧乾初恋生活的记录，是作者徜徉在回忆的河边而精心编织的一个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萧乾在感情生活上经历过太多的磨难，初恋的失意，使他一度沉湎于悲伤之中，但他并未消沉，他运用文学创作心平气和地咀嚼爱情的夭折，在忧伤的回味中生出对爱情本身完美的吟颂。爱的失落没有使萧乾失望于爱情，反而加深了对它的感触、过滤与净化，使之获得自己独特的美的感受。

《蚌》、《鱼》、《蟹》是梅娘写的水族系列小说。这三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之间并没有连续性，但争取婚姻自主和妇女人生解放的主题，像一根红线将这三部各自成篇的作品贯串为一个整体。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十分相近，再现了当年梅娘在东京与留学生柳龙光相识相爱，遭到家人粗暴干涉的情景。作者执著于爱情，以时代女性的热忱期待它，寻觅它，又苦于爱情的折磨，以满腔愤懑对封建礼教、封建专制提出了抗议。

另外诸如石评梅的小说《弃妇》表现的是对初恋情人吴天放打着自由恋爱的招牌纠缠女性的唾弃和对真心相爱的高君宇与原配妻子离异的怨言。巴金以爱妻萧珊为原型，塑造了《火》三部曲中女主人公冯文淑的形象。曹禺把对方瑞的爱，全都倾注在对《北京人》中愫方的刻画上。林语堂的小说《赖柏英》，写的就是他的初恋情人赖柏英，寄托着他那刻骨铭心的初恋之情。

由于作家的婚姻、爱情，同样有悲有喜、有苦有乐、有哭有笑，同样是一首哀婉动人的抒情诗，同样是一篇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所以，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艺术的灵感无不钟情于爱，而爱则又频频触发艺术的灵感。这样婚恋中有创作，创作中有婚恋，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强烈地诱发着作家们的创作欲，并由此促成了无数的现代文学名作问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学景观。

三、婚恋 促使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加快

“文学是人学”作为人类生活重要内容之一的婚恋自然与文学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从那些带有浓郁自传性的悲欢离合的婚恋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家个人命运的吉凶顺逆,往往还能折射出时代的各种光束。对真挚爱情的炽热追求也常常体现出社会的解放与文学的进步。作家们用自己亲身体会过的爱的故事,表达着对封建礼教的愤怒抗议,对处在旧道德文化重压之下的青年命运的深切同情。作家们把婚恋与革命融合在一起,极大地激励了革命青年的斗争热情,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家们把现代婚恋观念与现代派的文学表现技巧结合在一起,大大提高了现代文学的‘现代化’的品位,促进了现代文学朝着‘现代化’的方面发展。

中国现代作家的婚恋加快现代文学“现代化”的第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尖锐的反封建的时代锋芒和向旧伦理宣战的斗争色彩。五四时期,是中国人摆脱封建专制,从黑暗中觉醒的时代,作为这一觉醒的重大标志之一,就是现代性爱意识的产生。“性爱”本来是生理本能,是婚恋的自然基础,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却对它压抑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五四时期,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中华民族从沉睡中惊醒,跃起,重新审视宇宙、人生、艺术,自然而然,性爱意识成了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和反映的对象,这对推动历史和文学进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郭沫若是较早把“性爱”提升到神圣不可缺少的高度的作家之一。在他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残春》、《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里,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婚恋轨迹与主人公的婚恋轨迹的重合和对映,更重要的是他尽情宣泄了青春的苦闷和性爱的苦闷。这种对性爱的渴求与压抑的苦闷,是与五四时期社会的苦闷和

生存的苦闷合拍的。所以，作者在作品里融会更多的是社会情绪与新的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意义。

郁达夫在《沉沦》等自叙传小说里发出的“性的苦闷”的大声疾呼，更是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大胆挑战。他将性爱的描写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下，从审美心理的艺术视角加以观照，把人物性爱的苦闷当做时代的苦闷来表现，显示出一种浓重的凄苦的孤冷情调，从而对那个摧残人性的社会进行了彻底否定，充满着对社会的控诉与抗争。

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也涉及到了性爱表现的领域。她们非但有情可施，而且敢于谈性说爱，并将自身的婚恋感受汇成一股性爱文学的潮流，给当时文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使以后现代文学对女性人性的进一步探讨才成为可能。

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小说折射了她自身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情爱生活。但作者不为基本素材所限，而是在自身情爱经历的基础上大胆生发，超越了个人生活经历的狭隘境界，使作品显示出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义。她大胆肯定爱情的合理性，到逐步展开性爱标准的思考；从禁欲的爱情观到建立灵肉相统一的性爱观念，在发展中逐渐培养出健全的女性性爱意识。这种女性的性爱意识，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性爱权利的剥夺，是对封建男权传统的激烈否定，具有同时代男性作家无法替代的思想价值。

女作家们在表现现代性爱意识的同时，还把女性意识融入其中，这主要体现在对女性生存状貌和命运的观照，对被压抑的个性精神的高扬和对大胆追求爱情的礼赞上。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以觉醒了的新女性的视野，表现了对生的困惑、对爱的叩问，为女性的不幸命运发出了血和泪的呼喊。这种困惑、叩问和呼喊是作家在西方文化的感召下，产生的真正建筑在个体意志自由基础上的现代情爱，与当时中国封建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情况下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一种忧患意识，渗透着抗争、搏击、生生不息的

追求情绪,促进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氛围的不断生成与发展。

中国现代作家的婚恋加快现代文学“现代化”的第二个鲜明的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婚恋观的诞生与发展。在革命文学的作品中,一部分革命作家极力消解婚恋的个人色彩,无不崇尚基于共同信仰的彼此倾心,探寻婚恋与革命的关系。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不再作为个人的偶然事件,而是与革命密切相连,在对爱情的追求中,渗透了对理想新社会的热烈向往和信心。他们把个人的情感咏叹和政治斗争、时代风云紧密相连,以个性解放向社会解放的日趋交会,从独特视角开掘婚恋与革命的联系;他们把崇高的理想和革命因子融入其中,传达出革命的强劲精神脉动,对社会发挥着‘红色鼓动’的效应。

爱情生活自然是属于个人情感的天地,这些革命作家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青年,和普通人一样有爱情的欲求,但是,他们自觉摆脱儿女之情而献身革命。这正是作品灵魂的闪现,是作家品质的闪光。人们从中体味到人生的真谛,获取生活的良知。这种崇高的革命婚恋观在中国文学史是未曾有过的。

中国现代作家的婚恋加快现代文学“现代化”的第三个鲜明的特点,是情爱表现中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技巧的运用。西方现代派艺术传入中国文坛后,首先跟当时一批因个人婚恋而产生孤独、怅惘、悲怨、忧郁的作家在思想上有了共鸣。因为现代派的作品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悲观、厌世、迷惘、忧郁、空虚、寂寞等情绪,这些情绪正迎合了这些作家因不满婚姻现实或爱情失意的感受。于是,他们运用现代派常用的象征、暗示、隐秘等技巧,在文学创作中展示人生不如意的多重感伤与哀怨。

鲁迅的带有自传性的爱情小说《伤逝》和散文集《野草》中的部分作品都是出于自身婚恋的苦闷忧郁之作。郭沫若的《残春》、《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等小说写的也是自身情爱受到压抑而产生的苦闷感伤。在表现技巧上,他们都采用了现代派常用的象征、

暗示、幻想、幻觉、意识流等手法,创造出一种朦胧的意境美来。

李金发、戴望舒等诗人因个人婚恋的不幸而写的诗,是在一种智性化的心理体验分析中完成的,抒发的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派诗的意境。诗人对婚恋的表现,不是靠忠实地描绘客观物象,而是化为承载着某种感觉与情绪的意象,运用广泛象征,智性追求,进行多侧面、多视点和多层次的表现。因而,大大深化了诗歌内涵的密度和纵深感,使其呈现为一种无规则的发散型思维。所以,读他们的诗,既要依靠艺术想像在空间形式上组合、嫁接诗的形象,同时又必须作潜心的理性思考与逻辑环节的补充。他们写爱情,却又远远不止爱情。他们从自身的爱情事件中,提升到对芸芸万物、东西天下的观照,升腾起博大无边的玄思。如戴望舒的《雨巷》,从表层来理解可以说是一首爱情诗。由于爱的困惑和迷失,诗人将读者的心笼罩在一片黯然神伤与痛苦焦灼之中。但透过这些,我们还可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它带有深刻的哲理与思辨色彩,它更是人们理想与信念破灭、生命的内在力量遭到严酷压抑后的铭心苦闷与彷徨无依。传达的是一个时代一代人的心灵呼声,诗歌的抒情容量得到开扩,给读者以无穷的再创造的空间。这不仅提升了现代诗歌的品位,也有力促进了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作家的婚恋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理论上多有不足之处,但从作家的婚恋与其创作的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考察作家的创作灵感和心态,分析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角度,打开了一个新领域。本书选择了二十五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对他们的婚恋与创作的关联进行了专题论述。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里,还有许多饶有兴味的话题在诱惑着我们,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不断地有所发现。

鲁迅的婚恋在其创作中的 投影与折射

考察鲁迅的文学创作,我们总感觉充满着一种感时忧国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的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他追求爱情幸福和现实困顿的矛盾而形成的。所以,这种情绪承担着鲁迅在特定时期生存的苦恼和抗争的痛苦,更承担着历史留下的精神重担和时代的忧虑。表现了鲁迅从“小我”的痛苦出发,“苦吾苦以及人之苦”,抵达了“大我”的痛苦,以国家、人民之忧为忧的赤子之心。同时也使鲁迅产生一种永不衰竭的艺术冲动,一种源源而来的创作欲望,从个人的婚恋出发,始终向着国民的精神世界挖掘,创造出一篇篇惊世之作,显示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印记。

鲁迅说:“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①又说 he 写作品“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②。这样,作品便直接或间接地表述了作家个人对于生活现象的切身体验、感受,写出了自己的思想、愿望、好尚以及喜怒哀乐等种种情感。因而透过鲁迅的文学作品,我们异常清晰地看到了鲁迅个人的婚恋对其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

① 《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② 《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作品有着重要的意义。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伟大的文学大师，他的第一次婚姻也未能免俗，被打上了封建色彩的烙印。1901年2月，在家长的做主下，鲁迅与朱安正式订婚。1902年2月鲁迅回到绍兴家里，准备行装前往日本留学。他表示反对这门婚事，要求朱家姑娘另嫁他人。鲁迅到东京之后，又来信提出退一步的要求：让朱安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但朱家并没有理会。个人婚姻的不幸，使鲁迅感到一种难以摆脱的烦恼，感到一种异样的痛苦。但革命精神的亢进，又使他下定了献身祖国的决心。于是他写下了一首壮怀激烈的诗篇，这就是后来收于《集外集拾遗》中的被加题为《自题小像》的旧体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题小像》是鲁迅早期创作的一首极为重要的诗篇。作者在创作后三十年，曾重新把它写出来，足见他对这首绝句的重视。我们的评论者也十分重视这首七言绝句，但长期以来，大都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而忽略了鲁迅的不幸婚姻对这首诗的创作产生的影响。黑格尔说诗人“一旦从事于表达他自己，诗就开始了”^①。在这首诗里，鲁迅第一次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并抒发了决定承受因袭的重担，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誓言。其大意是：自己的心灵想逃也逃脱不了爱神丘比特胡乱射来的箭（“灵台”为“心灵”的意思，《庄子·庚桑楚》“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晋人郭象注说：“灵台者，心也。”），回首故乡，仍处于封建专

① 黑格尔《美学》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4页

制的笼罩之中。所以，自己虽多次写信向家长提出不同意这门婚事的意见，但家长却不觉察不理解（“荃”为“国君”的意思，这里引申为家长。《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王逸注：“荃，香草，以谕君也。”），于是，他只好忍受婚姻的痛苦，把满腔热血献给伟大的祖国。

1906 年，鲁迅在东京接到了家里电报，说母亲病重，要他回家。鲁迅带着一份焦虑回到家里，但迎接他的是准备好了的和朱安结婚的场面。看到事已至此，没法挽救，鲁迅只好违心地与朱安完婚，接受母亲送给他的这件“礼物”。婚后，他们行同路人，不但是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而且几乎是一个没有“婚姻”的婚姻。这对于正在热情地追求理想、幸福和爱情的青年鲁迅来说，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这就使他长期处于精神的苦闷和痛苦之中。而痛苦是产生思想的催化剂，这也就成了诱发鲁迅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在这种痛苦感情生活的煎熬下，鲁迅才写出了许多包含深刻思想的力透纸背的文学作品。因此，鲁迅所背负的绝非单单是自己一个人的痛苦和苦闷，同时也承担着中国社会思想变革期所有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所必然承担着的矛盾和痛苦。

1919 年 1 月，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发表《随感录四十》。起因是鲁迅收到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的一首题为《爱情》的散文诗，鲁迅读后，顿时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 麻痺

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会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①。

鲁迅深知，在封建婚姻制度下不知有多少无辜的牺牲者，因此，不能让自己的婚姻悲剧重演，他要呐喊，他要呼号，直到让青年们从封建主义的婚姻观里解放出来，历史的旧账一笔勾销。但鲁迅在自己的婚姻中，仍处于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之间的苦闷徘徊之中。他渴望得到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对封建包办婚姻不满，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同时又不愿意因自己的婚姻让母亲陷入痛苦不安的焦虑之中，不愿意给朱安造成更大的伤害、毁掉朱安的一生。所以只好维持着与朱安不幸的婚姻关系，“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这是母亲赐给自己的一枚苦果，自己只好无可选择地吞下。

鲁迅这种由婚恋而产生的矛盾心理，直接影响着他前期的思想

^① 《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和创作。《彷徨》中的部分小说,《野草》中的部分散文诗,都表现了鲁迅的这一心态。

在《野草》中,有不少描写大自然的篇章。这些散文诗缘于鲁迅的婚恋而生,流露了在爱神降临之时的复杂心绪,是鲁迅渴望情爱心理被激发以后的产物。

在《好的故事》中,鲁迅说在朦胧中他看见一个好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象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但是,“我正要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得水中,水波陡然起,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①“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②鲁迅在爱情上虽存有严重的自卑心理,但他内心世界仍然燃烧着炽热的爱情之火,他需要爱,需要一个知己的异性来温暖自己寂寞、冰冷的心。所以,鲁迅怀着对美的人和美的事的理想,真心地想要这梦中的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想要爱这美丽、幽雅、有趣的故事,希望着美的生活的到来。但是,梦醒后的美好境界是幻灭的,美的人和美的事都是虚幻的,鲁迅有着欲爱不能欲弃不忍的无奈、惆怅和悲凉。这正是当年他与许广平恋爱时特定的心绪和苦闷情怀的外在表现。他深爱着许广平,对他们美好的未来有着期待和憧憬,却又心存疑虑,只好长久地在爱情的大门前徘徊、叹息,对爱和美又有着难以化解的本能的怀疑。反映了鲁迅当时爱情理想与婚姻现实的重重矛盾以及引发的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腊叶》是一篇情感细腻、意味隽永的作品。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自述:“《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在《腊叶》一文中,他把自己心中钟情的女性——许广平的形象浮现了

① 《好的故事》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8页。